寻找慈善传统

近代上海少儿慈善机构音乐活动初探(下)

鸦片战争后，在华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教会学校、出版发行报刊、在洋务学堂担任教习等途径传播西方文化，推动“西学东渐”。在此背景下，清末民初上海少儿慈善机构突破传统“直接施舍”模式，实现“教养兼施”的救助体系转型，音乐实践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吴可凡　冯长春

据研究，1930年前后，仅上海一地的慈善团体多达119个。经文献梳理可大致确认，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至少有7所开展音乐教育及活动的少儿慈善机构，分为两类：教会类与华人创办类。前者有土山湾孤儿院和圣玛利孤儿院；后者有上海贫儿院、松江孤贫儿院、闸北惠儿院和广慈苦儿院。

土山湾孤儿院的音乐活动

1849—1850年间，中国受灾严重，江南地区尤甚，孤儿与弃儿人数剧增，法国籍耶稣会士施于民遂代耶稣会在横塘堂口修建了孤儿院。1864年，几经搬迁的孤儿院最终迁入徐家汇土山湾新址并持续办学，孤儿人数300余名。在一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土山湾孤儿院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职业教育和音乐教育两大部分。

根据已有史料可知，土山湾孤儿院的音乐课程参照西学综合人才的培养模式，引入西式音乐课堂内容。面对无专业音乐训练、最高学历不过初中的学生，音乐教师秉持有教无类、寓教于乐的理念，以本土化教材开展循序渐进式教学，开创了近代上海西方音乐启蒙教育的先河。土山湾孤儿院音乐教育的生动体现是合唱队的训练及演唱。

合唱队(亦称唱经班)是孤儿院音乐课中培养得较为成功的音乐社团，该班由专业音乐教师选拔音色合适的孤儿组成，每批十余人，成员多为10岁左右的男孩——因尚未到学艺或务工年龄，他们有较充分的时间接受音乐训练，待13岁左右进入发育期嗓音变化后，便自动退出合唱队。

土山湾合唱队通常分两个声部，主唱由音色最佳的孩子担任。日军占领期物资极度匮乏时，主唱是全院唯一享有牛奶供应的孤儿。每逢四大瞻礼或重要宾客到访，合唱队会在徐家汇大教堂二楼进行演唱，主要演出场所为土山湾慈母堂与徐家汇天主堂，演唱语言以法语和拉丁语为主。由于这些孩子文化水平有限，甚至许多人连普通话都未掌握，教师便采用沪语为拉丁语歌词注音以辅助记忆。这种方法简便高效——以沪语发音为基础，通过字体大小区分拉丁语的重轻音，借用简谱符号表示长短音，大幅降低了学习门槛。

根据当年在土山湾孤儿院生活过的李顺兴老人回忆，音乐课程令他印象深刻，现存《土山湾工艺院院歌》(即土山湾孤儿院院歌)也正是由李顺兴演唱而记录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音乐教育方面，土山湾孤儿院自行编写了较为系统的音乐基础教材——由葡萄牙人叶肇昌口述、上海人张石漱用上海方言笔录而成的《方言西乐问答》，以及由中国人卞依纳爵编写的《风琴小谱》。



土山湾鼓号队合影

土山湾孤儿院开设规范化音乐课程前，已存在一支颇具水准的乐队——最早可追溯到1858年法国传教士兰廷玉(Francois Ravary, 1823–1891)在徐家汇组建的管弦乐队(徐家汇乐队)。这是目前所见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西乐队，土山湾孤儿是重要成员。

1864年7月起，兰廷玉负责土山湾孤儿安置工作，同时安排他们加入乐队。同年11月22日，该乐队首次在法租界内公开演奏，演出十分成功，吸引了大批听众，法国驻沪领事葛笃对乐队赞赏有加。1871年，奥地利驻沪领事于布内参观土山湾孤儿工艺院，4位孤儿在一位中国老师的指挥下，为他演奏了《海顿交响曲》片段，于布内大为震惊并记录此事。后来随着兰廷玉调离徐家汇，乐队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1903年，在葡萄牙人叶肇昌的带领下，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正式成立“圣若瑟音乐班”，因使用的都是铜管乐器，对外又称“圣若瑟军乐队”，简称“土山湾乐队”，第一批成员有25人。1906年，在叶肇昌的竭力争取下，建成了固定的乐队排练场所。1910年10月，徐家汇天主堂举行开堂典礼，该乐队参演压轴曲目《圣母颂》，反响极好。此后，土山湾乐队招生不限年龄，无论是工艺院的学徒还是工人，有兴趣者均可报名，费用全免。乐队老师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教学，每周固定时间训练，且多安排在下班或放学后，不影响工作学习。

乐队的逐渐成熟离不开土山湾的师资队伍和精良的硬件设施。葡萄牙传教士叶肇昌作为该乐队创始人，不仅精通乐理，还擅长演奏小提琴、小号、单簧管等多种乐器，另外几位外籍传教士也各有所长。教学设施方面，乐队教具既有法国进口西洋乐器(小号、大号、圆号、长号等)，也有土山湾五金部修造的乐器，如大小风琴、铜钟等。

此外，土山湾孤儿院乐队在民乐演奏上也颇有造诣。孤儿不仅能自制竹笛，还自学吹奏技艺。1902年春节，乐队以管笛等乐器为工艺院戏曲演出伴奏；在1920年徐汇公学庆贺活动上，乐队演奏了丝竹乐以及琵琶独奏。此外，该乐队还曾在土山湾印书馆50周年纪念活动上，用民乐和风琴为纪念新歌同声伴奏，大获成功。

土山湾孤儿院的音乐教育与乐队是近代上海乃至中国最早的音乐教育活动之一，在西方音乐输入中国和中西音乐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重要城市之一，西方文化的输入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使少儿慈善机构得到新的发展。通过本文所论可以发现，近代上海少儿慈善机构较为普遍地存在音乐教育、组建乐队与演出等持续性的音乐活动，这些活动具有以下特点与历史意义。

首先是对音乐教化功能的重视。寓德于乐，发挥音乐的教化或德育功能，是自古至今人们对音乐社会功能极为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管是《礼记·经解》中“广博易良，《乐》教也”、《礼记·乐记》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者，德之华也”的音乐教化思想，还是西哲柏拉图“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更重要”的名言，均突出了音乐所被赋予的教化功能。由于一些少儿慈善机构具有教会背景，因此其中音乐活动对教化功能的重视又带有比较鲜明的宗教色彩。

其次是寓乐(lè)于乐(yuè)。正如荀子所言：“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不难发现，近代上海少儿慈善机构的音乐活动发挥了积极的“寓乐于乐”的功能。通过唱歌、练习乐器以及乐队排练、演出等音乐活动，一些少儿慈善机构为孤贫儿提供了宝贵的音乐实践机会。这些活动既温暖了孤贫儿的心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叶肇昌在《方言西乐问答》序言中所谓“可以作作乐，快活快活”的直白，是寓乐于乐的生动表述。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除上述音乐功能的发挥外，近代上海少儿慈善机构的音乐活动对于西方音乐在中国的输入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其中，土山湾孤儿院在引入西方音乐教育方面颇具开创性。该机构在教授孤儿工艺美术之余，率先引入西方音乐课程，使孤贫儿得以较为系统地学习西洋乐器与基础乐理，土山湾乐队及其演出不仅极大地活跃了孤儿院儿童的日常生活，同时还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此外，在音乐表演的培养层面，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的实践亦意义重大，它不仅培养了中国早期本土西洋乐器演奏人才，更以其社会化的精彩演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众对西乐的认知，提升了学习西乐在中国的社会影响力。

概而言之，近代上海少儿慈善机构的音乐活动，对于西方音乐在中国的输入与传播、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式音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早期音乐人才的培养等诸多音乐史学问题的研究，均具有值得重视的历史意义。当我们回顾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西乐东渐、新音乐文化的肇始与兴起，不应忘记还有少儿慈善机构的音乐活动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所发挥的历史影响。

(转自《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原标题为《近代上海少儿慈善机构音乐活动初探——以三所孤贫儿院为例》，有删减)



发行热线:010-65927745　广告热线:010-65953695　广告发布登记号:京朝市监广登字20170139号　投稿信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阎如玉律师、马健律师　印刷:保定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东风中路1835号